

北魏时期的云冈石窟

——根据考古材料对《水经注》关于云冈石窟 记载的探讨

谷 敏(云冈石窟研究院 文博馆员)

DOI:10.13619/j.cnki.cn11-1532/k.2017.02.006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城西 16 公里的武州(周)山南麓、武州川的北岸,其开凿自北魏和平元年(460 年),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年间,历经近 70 年。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约 1 公里,现存主要洞窟 45 个、附属洞窟 209 个。

云冈石窟原名武州(周)山石窟寺。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瀑水》中记载:“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祇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1]

然而,如何理解郦道元的上述记述?如何透过郦道元的记述来复原当时云冈石窟的整体面貌?本文通过历年来的考古发现情况,拟对其进行探讨。

一 窟前考古发现

对云冈石窟窟前区域进行的考古工作主要有 4 次。

第一次,1938~1940 年。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为代表的京都大学调查队对第 8 窟、五华洞(第 9~13 窟)前和昙曜五窟窟前地面进行了

发掘,发现了辽代和北魏两个时期的文化层及其所包含的遗迹、遗物。

第二次,1972~1974 年。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为配合云冈石窟的维修加固工程,对五华洞(第 9~13 窟)前进行了考古发掘,在第 9、10 窟前发现了辽金时期的砖铺地面和一座七开间的木构窟檐建筑遗迹、一组五开间梁槽遗迹。其中确认属于北魏时期的遗存包括第 9 窟前辽代铺地方砖下面的石窟前庭的原始基岩地面和第 10 窟前的原始基岩地面,前者多有残损,后者较完整。除此之外,在第 12 窟列柱上方还发现了北魏石雕瓦顶残迹^[2]。

第三次,1987 年。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对龙王庙沟(第 4、5 窟间的山谷)西侧的石窟进行了保护工程,并对龙王庙沟西侧洞窟窟前地面进行了发掘,清理出辽金时期窟前僧房、厅堂、蓄水池、地灶、火炕等遗迹^[3]。

第四次,1992~1993 年。为配合云冈石窟“八五”保护维修中的降低窟前地面工程,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两次对云冈第 8~20 窟、第 1~4 窟窟前地面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发现的遗迹、遗物主要有七个方面。其一,在昙曜五窟(主要

为第20窟)和第9、10窟前发现了两组与壁面上大梁孔相对应的建筑遗迹(F5、F6);其二,在第20窟前发现了北魏烧土层和北魏时期修葺的石踏道、石墙与石坝遗迹;其三,在第9、10窟前地面上发现了五个团形莲花图案和一些龟背形图案的雕刻纹;其四,在第3窟发现了开窟取石的痕迹;其五,在昙曜五窟前发现了辽金时期的部分铺地砖;其六,在第9~13窟前的地面上发现了排列整齐的辽金时期三排柱穴遗迹;其七,在第3窟前发现了唐、辽时期的文化层以及金代“九间灵岩大阁”的地面柱穴遗迹。

根据以上考古工作,部分发掘者研究认为,第9、10窟前的基岩面上雕以纹饰与龙门的宾阳洞相似,是北魏时的作品,而且当时窟前有一个木构窟檐将窟门与这些雕有花纹的地面罩在其内。第12窟从外观上看,应为崖阁式建筑,与天水麦积山石窟七佛阁式样相似;从建筑年代上来说,第12窟新发现的仿木构建筑在全国现存崖阁式洞窟中是最早的一处。

F5位于第20窟前基岩地面上,从西向东排列着24个大方柱穴,每个大方柱穴四角周围又有4个小圆柱穴。大方柱穴与石窟立壁上的长方形梁孔相对应,应是同一时期的建筑遗存。与F5同时发现的,还有第20窟外地层中残存的一层含有大量北魏瓦片和木炭屑的烧

土堆积。

F6即为20世纪70年代在第9、10窟前发现的七开间木构窟檐建筑,第四次发掘时又对其进行了系统清理。F6有一排8个东西向排列整齐的大方柱穴,每个方柱穴不仅周围四角皆配以4个小圆柱穴,且可与洞窟立壁上的长方形梁孔相对应。每个方柱槽(即柱穴的槽)边长1~1.18、深0.18~0.52米,底面凿成覆盆式圆形柱础。柱槽内还发现较多木炭,说明这座建筑可能毁于火灾。原发掘者认为,F6的柱槽压在辽代铺地砖下面,应是辽以前的遗迹,但从柱础位置与窟前铺地花纹的关系看,部分柱础又“压”了铺地花纹,故七间式窟檐建筑的始建年代应在第9、10窟全部雕刻完成之后。

综合F5、F6的发掘情况,并结合石窟前25米即为北魏河床的地理条件,笔者认为这些建筑很可能就是《水经注·灋水》中“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所记载的情形。

笔者在对大量考古发掘记录进行仔细分析研究的过程中,对大小不同的两类柱洞的时代问题和功能用途形成了一些新的看法,下面详细叙述。

F5、F6两组建筑遗迹地表所在岩面上有排列整齐的柱穴(图一)及包含大量北魏时期磨光瓦片的烧土层,且柱穴与壁面上的大梁孔相对应。原发掘者认为,岩面上排列整齐的大方柱穴及大方柱穴四角相配的4个小圆柱穴是同一时期、同一类型的建筑遗迹。而笔者则认为它们属于不同时代。下面以第20窟前的F5为例,介绍如下。

对第20窟前进行的发掘表明,窟前地层可分为4层,从上至下依次为第①层表土层、第②层黑土层、第③层烧土层和第④层碎石层,再下为基岩地面,基岩地面上凿有柱穴。通过分析可以判断,烧土层为北魏文化层,黑土层为辽金文化层。

小圆柱穴几乎遍布整个窟前地面,距石窟前壁8~9米,呈南北两排分布,南北排间距2.5~4米,东西穴间距



图一 第20窟前发现的大方柱穴与小圆柱穴

2.5~4米。小圆柱穴开口于第③层烧土层下,呈圆筒状,直壁,平底,有大小两种规格,一种直径0.15~0.29米,另一种直径0.31~0.39米,均深0.28~0.42米。柱穴内壁刻斜向凿痕,凿痕间宽2~5厘米。柱穴内填土土质较硬,有夯实现象,可分3层,上层为黑土,中层为黄土,下层为由碎石、沙土、细沙组成的混合土,其中上层和中层的填土较薄,其内包含木屑、未腐烂的木柱痕及红烧土、木炭、烧黑的石块等。部分柱穴上有石片铺垫,但均不超出基岩地表面。

大方柱穴亦分布于整个窟前范围内,距石窟10~11米,东西向直线分布,穴间距6米。大方柱穴开口于第②层黑土层下,平面呈方形,直壁,平底,边长1~1.5、深0.4~0.5米,四壁均有凿痕并经打磨。柱穴内填土分2层,上层为黑土,包含砖块、石块、料炭及红烧土块;下层为灰黄色硬沙石土,包含炭渣及烧黑的石块。部分柱穴底部还发现圆锥形柱窝,出土柱础石块、板瓦、筒瓦、勾纹砖及铁皮等。

根据以上信息可以发现,小圆柱穴和大方柱穴不仅大小、形制有别,开口层位、柱穴内的填土及包含物亦有所不同。小圆柱穴开口于第③层烧土层下,填土中有碎石、沙土和细沙,不见木炭烧痕;大方柱穴开口于第②层黑土层下,填土中可见较完整的被烧毁的柱痕。因此,二者应并非同一时代的建筑。结合其他发掘情况推测,小圆柱穴的年代应为北魏,大方柱穴的年代应为辽金;小圆柱穴的功能用途可初步推断为长廊式木构建筑的柱洞。

二 窟顶考古发现

对云冈石窟窟顶区域进行的考古发掘主要有3次。

第一次,1938~1949年。日本学者在云冈山顶进行发掘,在西部山顶和东部山顶发现了北魏时期寺院遗址,在龙王庙沟发现了一处辽代寺院遗址,出土了北魏板瓦、筒瓦、莲纹瓦当、“传祚无穷”瓦当和带绿釉的或无釉但边缘有波状纹样的“滴水”^[4]。

第二次,1993年。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在东部窟群山顶的最东侧、西距云冈石窟第1窟约300米处发现了一处“云冈山顶塔基遗址”。塔基基座坐北朝南,北面正中有一条通向北面斜坡的慢道,其或仅为北面寺院的一部分。本次出土器物以砂岩质的北魏造像残件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莲花帐座和“传祚无穷”瓦当及7个石刻兽头门墩。

第三次,2008~2011年。为配合云冈石窟窟顶防渗水工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云冈石窟研究院等单位对施工区域进行了考古调查、钻探和发掘,共发现两处佛教寺院遗址。其中,西部寺院遗址(第39窟以西)较完整,包括北廊房、东廊房、西廊房、南廊房、塔基和砖瓦窑等遗迹,是一处北魏时期以塔为中心的塔院式寺庙建筑遗址,可能是云冈译经场所或高级僧侣生活区;东部寺院遗址包括塔基、石柱础、铸造井台、熔铁炉、水井等遗迹,时代为北魏至辽金时期^[5]。这两处遗址均属北魏云冈寺院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现存考古发现看,云冈石窟第39窟顶以西和第5、6窟顶及第1、2窟顶均发现有北魏时期的寺院遗址,其中已发掘的遗址都经过辽代重修。这些考古发现证实了北魏时期的云冈石窟不仅是洞窟和窟前建筑,还应当包括山顶庞大的寺庙建筑。

三 对《水经注》关于云冈石窟记载的新认识

最早对云冈石窟进行记载的就是上述《水经注·灋水》中的一段话。北魏时期的云冈石窟从文成帝复法之年开始至孝文帝迁都洛阳,有近四十年皇家性质的开凿史。对于北魏时期云冈石窟的开凿,学术界把它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年代为460~465年、中期年代为471~494年、晚期年代为494~524年。《水经注》约成书于6世纪初,宿白认为郦道元在《水经注·灋水》中描述的应是中期晚段至晚期开始时云冈石窟的情形^[6]。因此,《水经注》中对云冈石窟的记述应是其最辉煌时期的实录,最为真实可信。

(1)“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祇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

这一段首先记述了武州川水在云冈石窟附近的流向。根据实地调查,武州川水在今吴官屯村附近改变了原自西向东的流向,折向东南,流经大约1.5公里后又向东折转,恢复成自西向东的流向。

“石祇洹舍”是用石头所砌造的房子。祇洹舍,简称“祇洹”、“祇园”,全称“祇树给孤独园”、“胜林给孤独园”、“祇洹精舍”。“并诸窟室”是指房子旁又有开凿的石窟。房子与石窟的位置关系,可以有前房后窟、房窟并列等多种形式,这一点郦道元并没有在《水经注》中做出明确说明,但根据地形特点来看,前房后窟的形式可能性较大。

比照郦道元的记载,在今云冈以西约1公里的十里河西岸,有一座石窟与云冈石窟隔岸相望。此窟坐西朝东,依山傍水,现存的洞窟形制与云冈早、中期石窟相似,窟前有后代的建筑遗迹。张焯在《云冈石窟编年史》中指出:“鲁班窑石窟,坐西朝东,有窟室三所。无论就《水经注》记载分析,还是从遗迹考察,属于北魏尼寺的可能性更大。”^[7]由此判断,此窟应就是原文所云“比丘尼所居也”之比丘尼居住的寺院^[8]。

(2)“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

“凿石开山”就是依照山体形状开凿出岩石壁面。“因岩结构”在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是石窟外壁加盖木构建筑,也有说是仿石雕木构殿宇,还有说是因岩石的不同质地而雕刻不同的内容^[9]。笔者赞同后一种说法。

早在北魏定都平城的初期,武州山即被奉为神山、灵山^[10]。开凿皇家石窟,只有在京城近郊才便于集中大量人员进行施工,同时也便于以后皇家的往来礼拜。踏勘平城周围地形,仅西部有高大绵延的山脉。具体来看,武州山顶部平整,山下河水川流不息,对面视野开阔,山体容易切削成壁,岩性较软易于雕刻,这都符合皇家凿石开窟的基本条件。

斩山为壁,依照岩石壁面凿石开窟,做成

庞大的窟室、整齐的廊柱、高大庄严的造像,亦与高允在《鹿苑赋》中“灵崖以构宇,疏百寻而直上;纒飞梁于浮柱,列荷华于绮井”^[11]的描述相印证,也即云冈石窟“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的写照。

(3)“烟寺相望”

1919年,陈垣对涉及云冈石窟的文献进行了考证,发表了《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后在《云冈石窟寺之译经与刘孝标》一文中,首次论及云冈的译经活动。文中指出,昙曜是云冈石窟的创凿者,也是云冈译经的始创者^[12]。所以这里既开凿石窟、雕刻佛像,也翻译佛经^[13]。

关于佛经翻译的场所,文献记载和平三年(462年)昙曜“于北台石窟寺内集诸僧众,译斯传经……”^[14]译经人数众多,则需有一处较大的译经场所,在云冈石窟周围区域内,仅窟顶的开阔地带具备这个条件。从目前考古发掘情况来看,云冈石窟窟顶已发现3处北魏时期以塔为中心的塔院式寺院遗址。这些寺院可能就是云冈译经场所或高级僧侣生活区,属北魏云冈寺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昙曜译经的僧院在云冈石窟山顶东部台上^[15]。

考古发掘的平城“思远灵图”、龙城“思燕浮图”和洛阳永宁寺均为具有皇家性质的北魏大寺,其共同特征就是以方形木构楼阁式塔为寺院的主体建筑,位居寺院中心,木塔后有大型佛殿遗迹。这种“前塔后殿”式建筑布局代表了北魏时期佛教寺院布局的典型样式。云冈窟顶的寺院布局也与上述诸例基本相似,仅塔的形制略有不同。1993年发掘的云冈山顶塔基遗址^[16]显示了这种形制上的差异。此塔为实心塔体的方形石塔,此种形制与北魏曹天度石塔、云冈窟内雕刻的中心塔柱浮雕佛塔式样相似,显示出云冈佛塔的独特性。这些建造在山顶之上的寺庙恰与郦道元《水经注》所记载“烟寺相望”中的“烟寺”相符。

(4)“山堂水殿”

昙曜五窟的外立壁呈一基本平直的正东西向壁面,现整体外观面貌应与开凿之初差异不大,均为穹隆顶大像窟、上凿明窗、下开窟门

的建筑形制^[17]。

根据以往对窟前的发掘情况,有研究者认为第20窟前发现的若干大方柱穴和其四角的4个小圆柱穴属于同一时期的窟檐建筑遗迹。而笔者在前文中已将大方柱穴与小圆柱穴区分开来,并认为小圆柱穴应属于北魏时期,大方柱穴属于辽金时期,小圆柱穴代表的可能是窟前长廊式木构建筑,或为礼佛之前的休憩与准备场所。

五华洞及其相邻的窟室外壁,都保存有与内部隔墙位置相对应的崖垛,且将它们设计与雕刻成佛塔或立碑的形式。这些洞窟规划以双窟形制为主,迎合当时孝文帝与文明冯太后并称二圣的政治局面。考古发现第12窟窟檐上方有石雕瓦垅、屋脊,与檐下的列柱构成三开间宫殿式结构,是中国殿堂结构式石雕窟檐。此种仿木构建筑的石雕窟檐,见于麦积山、天龙山和响堂山诸石窟^[18]。这种有廊柱殿堂式的洞窟很可能就是郦道元《水经注》所记“山堂水殿”中“山堂”的具体反映。

1992~1993年对窟前的考古发掘表明,云冈石窟窟前存在着北魏、辽、金等不同时期的



图二 云冈第14~20窟前河坝遗址

建筑遗存。其中,北魏时期的建筑遗存主要是小圆柱穴。这种直接凿在基岩上的柱穴均以南北两排的形式东西向排列,且崖面上没有与其相对应的梁孔,所以排除了窟檐建筑的可能,其或与第20窟前北魏建筑的形制相同,即长廊式建筑。由于昙曜五窟与无名窟中间有一道冲沟,如果进一步推测,此长廊式建筑很可能是当时连接二者的廊桥。此外,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还在第14~20窟前南25米处发现了一条东西向大坝,已探明长度120米,坝体用石块砌成,与河床走向相同(图二)。这显然是北魏时期武州川水(今十里河)的河道位置,亦与佛教石窟“依山傍水”的特点要求相符。按照这个距离推算,长廊外侧距河坝仅有十余米,这样绵延的长廊就会在河水中形成若隐若现的水上殿堂。这种景象很可能即是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所云“山堂水殿”中的“水殿”。

(5)“林渊锦镜,缀目新眺”

据《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记载:“太祖好老子之言,诵咏不倦。天兴中,仪曹郎董谧因献服食仙经数十篇。于是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封西山以供其薪蒸。”^[19]北魏初,太祖封闭西山(武州山)以供“煮炼百药”的薪蒸,说明当时的武州山树木茂盛,能够提供所需的薪柴。同时,对武州山的封闭禁令又在客观上保护了这里的树木及整体环境,这才会使郦道元发出“缀目新眺”的深切感叹。

四 小 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将云冈石窟山顶的寺院遗址纳入云冈石窟整体系统之中,结合洞窟和窟前建筑及周围环境,揭示了北魏时期云冈石窟的整体风貌——武州山山顶塔庙掩映于山林之中,凿于山壁的石窟法相庄严,倒映在水中的殿堂隐隐浮现,呈现出一个三位一体的佛国世界,由此也就复原了郦道元在《水经注·漂水》中所记载的“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的景象。

附记:本文写作得到了张焯、张庆捷、刘建军等先生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致谢。

- [1] (北魏)酈道元原注、陈桥驿注释《水经注》卷一三《灤水》,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
- [2] 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等《云冈石窟建筑遗迹的新发现》,《文物》1976年第4期。
- [3] 赵曙光《龙王庙沟西侧古代遗址清理简报》,《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二),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94年。
- [4] [日]长广敏雄、[日]水野清一著,曹臣明译《云冈发掘记(二)》,《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 [5] 《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文物报》2012年4月15日;张庆捷等《山西云冈石窟窟顶北魏寺庙遗址》,《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1年。
- [6] 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 [7] 张焯《云冈石窟编年史》,文物出版社,2006年。
- [8] 此外,“在云冈石窟西约七华里的吴官屯和三十余里处的高山镇附近均有石窟遗迹,但均不在‘川水又东南流’的水侧旁。唯独现存的鲁班窑石窟之地理位置与记载相吻合。因而认定北魏酈道元笔下的比丘尼所居处即是今鲁班窑石窟之位置,也就是北魏时期云冈石窟的‘尼寺’”。参见陆屹峰、员海瑞《云冈石窟尼寺考》,《文物季刊》1989年第1期。
- [9] 杭侃《云冈第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昙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设计》,《文物》1994年第10期。
- [10] 《魏书》卷一〇八《礼志一》,第2736页,中华书局,1974年。
- [11] (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二九《鹿苑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张焯判定此赋讲述了北魏献文帝时平城郊外鹿野苑佛事建设的盛况及当年营造云冈石窟的情景,参见张焯《鹿苑赋》与云冈石窟》,《中国文物报》2003年10月31日。
- [12] 陈垣《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云冈石窟寺之译经与刘孝标》,《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年。
- [13] 《历代三宝记》载,“和平三年,诏玄统沙门释昙曜,慨前凌废,欣今载兴,故于北台石窟寺内集诸僧众,译斯传经流通后贤,庶使法藏住持无绝”,(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九,《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载,“昙曜又与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又有沙门道进、僧超、法存等,并有名于时,演唱诸异”,第3037页,中华书局,1974年;《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撰出经律论录第一》载,“《杂宝藏经》十三卷,阙;《付法藏因缘经》六卷,阙;《方便心论》二卷,阙。右三部,凡二十一卷。宋明帝时,西域三藏吉迦夜于北国,以伪延兴二年,共僧正释昙曜译出,刘孝标笔受”,第62~63页,中华书局,1995年。
- [14]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九,《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北台石窟即文献中对云冈石窟的称谓。
- [15] [日]冈村秀典《云冈石窟遗物篇》,(日)朋友书店,2006年。根据瓦的编年来看,东部台上寺院遗址出土有云冈一期的瓦。
- [16] 刘建军《新中国云冈石窟的考古发现》,《中国文化遗产》2007年第5期。
- [17] 同[9]。现在第20窟的前立壁、第19窟的西耳洞前立壁均缺失,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很可能是由于北魏时期坍塌所致,而非当时没有规划开凿。
- [18] 同[2]。
- [19]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第3049页,中华书局,1974年。

(责任编辑:戴茜)